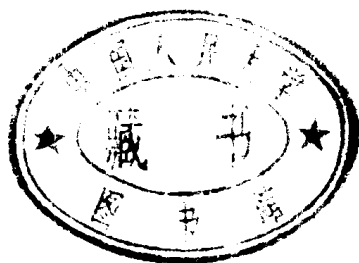


章學誠遺書

〔清〕章學誠撰

章學誠遺書

文物出版社



封面題字 許覺民
封面設計 張鳳寶

章 学 诚 遗 书

〔清〕章学诚 撰

*

文 物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五四大街29号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1985年8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787×1092 1/16 印张：45

统一书号：11068·1383 胶版纸定价：22.00元

影印《章學誠遺書》序

章學誠，字實齋，號少岩，浙江會稽人，生於清乾隆三年（公元一七三八年），卒於嘉慶六年（公元一八〇一年），是十八世紀我國杰出的史學理論家。

章學誠從少年時就愛好史學，二十歲以後，「縱覽羣書，於經訓未見領會，而史部之書，乍接於目，便似夙所攻習者。」（《家書六》）後寓居京師，師事內閣學士朱筠。朱筠多藏書，好賓客，一時名流學者如戴震、錢大昕、程晉芳、任大椿、汪輝祖、邵晉涵、周永年、洪亮吉等多出入其門。章學誠也因得與他們論交。乾隆四十三年（公元一七七八年），章學誠中進士。此後畢生從事著述和講學，先後主講定州定武書院、肥鄉清漳書院、永平敬勝書院、保定蓮池書院和歸德文正書院。著作甚富。

章學誠生活在漢學盛行的乾嘉之世。被當時學者奉為宗師的惠棟、戴震等，倡導以音韻訓詁、名物考據為通經之要。但及其末流，學者多舍本逐末，以訓詁考據、博聞強識為「足盡天地之能事。」章學誠很不滿這種脫離實際的學風。他繼承清初黃梨洲、萬斯大、萬斯同等浙東學術之餘緒，強調經世致用，反對知古而不知今，反對只是埋頭於故紙堆中去「妄求遍物」而不知「大義」。（《博學中》、《博學下》）他說：「學術固期於經世也，……得一言而致用，愈於通萬言而無用。」（《說林》）這是針對當時迴避現實的學風的有力抨擊。針對時弊，章學誠提出了「六經皆史」的著名學說。在章學誠看來，六經「乃三代盛時典章法度見於政教行事之實，而非聖人有意作為文字以傳後世」，（《經解上》）「六經皆史也，……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又說：「六經皆先王得位行道，經緯世宙之迹，而非托於空言。」（《易教上》）總之，他認為，「道不離器，猶影不離形。後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經，以謂六經載道之書也，而不知六經皆器也」。（《原道中》）這也就是說，六經並不是某一聖人憑主觀

臆想寫成的，而是當時統治者治理國家大事的事迹，和各種典章制度的記錄。周公、孔子所講的「道」是離不開這些具體的事迹和典章制度的。他進一步根據歷史的事實申述說：「古無經史之分。」（《丙辰割記》）「六經初不爲尊稱，義取經綸爲世法耳。」（《經解下》）「後世貴經術，以其即三代之史耳。」（《浙東學術》）這是說早先根本沒有什麼叫經的，六經也沒有後世那樣被人們捧得那麼高，六經之所以值得重視，只是因爲六經是當時經世致用的典籍，其中有許多經驗可供後世學習和借鑒。在這裏，章學誠闡明了六經原本的性質，肯定了六經的價值，同時又揭去了六經的神聖外衣，把六經納入史籍的範疇。

章學誠的「六經皆史」說，也是針對宋明以來以至當世那些脫離人事而空談性命道德義理的學風而發的。這在他《浙東學術》一文中，有明白的論述。他說：「通經服古，絕不空言德性。」「儒者欲尊德性，而空言義理以爲功，此宋學之所以見譏於大雅也。……故善言天人性命，未有不切於人事者。」「知史學之本於《春秋》，知《春秋》之將以經世，則知性命無可空言，而講學者必有事事。」「近儒談經，似於人事之外別有所謂義理矣。浙東之學，言性命者必究於史，此其所以卓也。」由此可見，章學誠對史學的重視，是同他的經世致用的觀點直接聯係在一起的。他還說：「盈天地間，凡涉著述之林，皆是史學」，（《報孫淵如書》）「史學所以經世，……正以切合當時人事耳，後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學者不知斯義，不足言史學也。」（《浙東學術》）「六藝古史之遺，後人不盡得其淵源，故覺經異於史耳」，（《丙辰割記》）「子集諸家，其源皆出於史。末流忘所自出，自生分別，故於天地之間別爲一種不可收拾不可部次之物」。（《報孫淵如書》）章學誠把一切學術著述都歸結爲史學的論斷自然不無可議之處，但他的出發點是爲了強調一切學術著述都是經世致用的手段，這不能不說是章學誠在史學理論上的一種創見。

從經世致用的目的出發，對當時漢學家的煩瑣考據、一味好古和宋學家的空談性天，章學誠都進行了尖銳的批判。他說：「君子苟有志於學，則必求當代典章以切於人倫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於經術精微，則學爲實事，而文非空言，所謂有體必有用也。」他指出，「不知當代而言好古，不通掌故而言經術，則聲貌之文，射

覆之學，雖極精能，其無當於實用也審矣。」（《史釋》）其實，「天下但有學問家數，考據者乃學問所有事，本無考據家。」（《與吳青石簡》）這就從根本上否定了爲考據而考據的錯誤學風。對於宋學的流弊，他認爲在於「以道名學，而外輕經濟事功，內輕學問文章，則守陋自是，枵腹空談性天」。（《家書五》）這同樣是不可取的。總之，章學誠認爲：史不離事，道不離史，史學應成爲經世致用之學。

章學誠在史學理論上的具體貢獻，大致可歸納爲如下幾個方面。

首先，章學誠對傳統的史學分類法提出了嶄新的見解。傳統的史學分類法，一般只着眼於史學著作體裁上的分類，如「編年體」、「紀傳體」，並奉這兩種體裁爲史學的正體，凡不合這兩種體裁的史學著作，則統歸之爲「別史」。章學誠對史學著作的分類則着眼於內容上的區別。他認爲，無論史學著作體裁如何不同，從內容上來區分，要不外乎「著述」和「比類」（或「撰述」和「記注」）兩大類。對於某一著作來講，兩者不必兼備，而對整個史學來講，兩者又是缺一不可，相輔相成的。他曾對歷史上的一些史學著作加以分類說：「班氏撰《漢書》，爲一家著述矣；劉歆、賈護之《漢記》，其比類也。司馬撰《通鑑》，爲一家著述矣；二劉、范氏之《長編》，其比類也。兩家本自相因，而不相妨害。」那麼「著述」和「比類」（或「撰述」和「記注」）有什麼不同呢？在《書教下》中，章學誠分析說：「間嘗取其義以概古今之載籍，撰述欲其圓而神，記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來。記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來者之興起。……藏德欲其賅備無遺，故體有一定，而其德爲方；知來欲其抉擇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爲圓。」這是說「記注」是記錄歷史上的史事的，因此需要「賅備無遺」，依照一定體例；「撰述」則是通過史事引出經驗教訓，以爲將來之借鑒，因此需要有所「抉擇去取」，發揮見解，不必拘守一定的體例。這一區別相當於我們今天所講的史料匯編與專門著作之間的分別。章學誠對這種區別還作了形象的比喻。他說：「蓋著述譬之韓信用兵，而比類譬之蕭何轉餉」。（《報黃大俞先生書》）也就是說，一者是創造的運用，一者是史料的轉載。

章學誠揭示了歷來的史學理論不注意「著述」和「比類」（或「撰述」和「記注」）的區別，往往把史料

的纂輯排比與通過對史事的去取來發明義理的著述混而等之的弊端。對於這兩類史籍，他尤其注重於著述之作，並認為，這才是作史的根本意義所在。這也就是他們所說的「作史貴知其意」。（《言公上》）有人把他的史學理論比擬於唐代著名的史學理論家劉知幾，他明確地回答說：「不知劉知史法，吾言史意；劉議館局纂修，吾議一家著述。截然兩途，不相入也。」（《家書二》）他認為，劉知幾在史學理論上只在「史法」上有所發明，而尚未得「史意」也。那麼，他所謂的「史意」的含義究竟是什麼呢？劉知幾在談到「良史」應具備的條件時，曾提出「史才」、「史學」、「史識」三者。章學誠對此是肯定的。他說：「才、學、識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難。……史所貴者義也，而所具者事也，所憑者文也。……非識無以斷其義，非才無以善其文，非學無以練其事。」（《史德》）章學誠所強調的「史意」，重點也是強調「史所貴者義也」。從表面上看，與劉知幾所說的「史識」相似，但他認為，劉知幾的「史識」只是從「史法」的角度講的，而他所說的「史意」則是從作史者的指導思想來說的，即所謂「史家著述之道」。（《申鄭》）在章學誠看來，「學術無有大小，皆期於道。……是故君子即器以明道，將以立乎其大也。」（《與朱澹湄中翰論學書》）史家著作貴在體現作者的取捨原則，獨到見解和「著述之微旨」。（《大名縣志序》）這也就是他所竭力推崇的「一家之言」、「專門著作」。他指出：「開局設監、集衆修書，正當用其義例，守其繩墨，以待後人之論定則可矣，豈所語於專門著作之倫乎？」這是說，館局纂修之史往往墨守成例，「纂輯比類，以存一代之舊物」，而缺乏「推明大道」和創見；這種史學著作對於經世致用來說遠遠不夠的。於是他發揮說：「以夫子「義則竊取」之旨觀之、固將綱紀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變，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詳人之所畧，異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輕，而忽人之所謹，繩墨之所不可得而拘，類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後微茫秒忽之際，有以獨斷於一心。及其書之成也，自然可以參天地而質鬼神，契前修而俟後聖，此家學之所以可貴也。」（《答客問上》）由此可見，章學誠所講的「史意」，旨在提倡作史者應有自己的獨到見解，探求歷史事件和發展中的所以然，以期「窺道之全量」。（《答沈楓堦論學》）正因為這樣，章學誠十分重視文史之「通義」，贊賞私家著述。這在當時來說，反映一些進步史學家對官修「正史」所

設各種條條框框的不滿。

其次，章學誠在史學理論上還着重強調了「史德」的重要性。所謂「史德」是指「著書者之心術」，即史家的學術品德。他認為，對一個史學家來說，只要求其「才、學、識」而不辨其「心術」是不行的。他對於史學家學術品德的要求最根本的一條是「當慎辨於天人之際，盡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如果能做到「盡其天而不益以人，雖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稱著述者之心術矣。」（《史德》）他這裏所說的「天」，即客觀的歷史事實或道理，而「人」，則是指著書者的主觀好惡感情。「盡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就是要求著書者尊重客觀真理，而不摻雜以主觀成分。可見他所謂的「史德」，也就是要求史學家必須具備一種忠實於客觀真理的學術品德。

章學誠為什麼這麼強調「史德」的重要呢？這是因為他看到「史之義出於天，而史之文不能不藉人力以成之」，但由於「人有陰陽之患」（主要指好惡感情），結果表現在史文（著作）上就會出現「似公而實逞於私，似天而實蔽於人也」，而「忤於大道之公」的情況。他還指出，由人的這種「陰陽之患」是「乖於血氣，而入於心知」的「默運潛移」，不易覺察，往往「至於害義而違道，其人猶不自知也。」（《史德》）因此更應時時自覺警惕。他在《與史氏諸表姪論策對書》一文中說：「僕於學業，亦小有得，故平日言論，亦小有家數。……然意皆一律，從無欺飾，……生平惟此「不欺」二字，差可信於師友間也。」

此外，章學誠所謂「史德」中，還包含了史學家從事著作並非為爭一己之短長，只要其言有益於世，就不當爭此言為誰所有。這也就是他在《言公》中所表述的思想。他說：「古人之言，所以為公也，未嘗矜於文辭，而私據為己有也。志期於道，言以明志，文以足言。其道果明於天下，而志無不申，不必其言之果為我有也。」又說：「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舒其所憤懣，而有裨於風教之萬一焉，是其所志也。因是以為名，則是爭於藝術之工巧，古人無是也。」他指出：「古人之言，欲以淑人；後人之言，欲以炫己。」因此，他又沉痛地呼吁說：「立言之士，將有志於道而從其公而易者歟，抑徒競於文而從其私而難者歟？公私難易之間，必有辨矣！嗚呼！安得知言之士，而與之勉進於道哉！」這也就是他要求史家應具的「史德」之一。

章學誠在史學理論上還有一個重要貢獻，是他比較系統地提出了一套編纂地方志的理論原則和方法，這是他長期從事地方志編纂工作的實際經驗的總結。

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多設有史官記事，這是我國地方志的濫觴。隋唐時期，出現了官修的地方志。到了宋代，地方志更爲盛行，編纂體例、規模和組織都遠遠超過了前代。但是地方志能够成爲史學中的一門專門的學科——方志學，却應歸功於章學誠。在章學誠的著作中，有大量關於地方志的論述。他對地方志的性質、編纂體例、取材標準、內容以至設立編纂地方志的專門機構等等，都有全面的壁劃和重要的建議。

章學誠對地方志的貢獻，最重要的是規定了地方志的性質。他極力主張「志乃史體」，（《答甄秀才論修志第一書》）和「志屬信史」，（《修志十議》）指出地方志是屬於史學範疇的一門獨立的學科，反對歷來把地方志視爲地理書的錯誤觀念。他明確說：「地理之學，自有專門，州郡志書，當隸外史。」（《釋通》）在《大名縣志序》中，他又進一步闡述了這個觀點，說：「郡縣志乘，即封建時列國史官之遺，而近代修志諸家，誤仿唐宋州郡圖經而失之者也。……若夫圖經之用，乃是地理專門。按天官司令所掌書契版圖，……即後世圖經所由仿也。是方志之與圖經，其體截然不同，而後人不辨其類，蓋已久矣。」章學誠說史書有各種區別，「有天下之史，有一國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傳狀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譜牒，一家之史也；部府縣志，一國之史也；綜記一朝，天下之史也。」章學誠所說「天下之史」，指的是綜記全國的史書；「一國之史」，指的就是地方志。章學誠認爲地方志應「爲天下之史所取裁」，（《州縣請立志科議》）而圖經係地理專書。既指出了地方志的性質和作用，又說明了地方志和地理書之間的區別。這就從理論上明確了地方志的性質，使地方志建立在比較科學的基礎上，成爲史學的一門新學科。

章學誠對地方志的編纂體例和內容，也提出了明確的主張，即地方志必須包括「三家之學」。他說：「古無私門之著述，六經皆史也。後世襲用而莫之或廢者，惟《春秋》之流別也；掌故典要，《官禮》之流別也；文徵諸選，《風詩》之流別也。……馬《史》班《書》以來，已演《春秋》之緒矣；劉氏《政典》、杜氏《通典》、

始演《官禮》之緒焉；呂氏《文鑒》、蘇氏《文類》，始演《風詩》之緒焉。並取括代爲書，互相資證。」又說：「凡欲經紀一方之文獻，必立三家之學，而始可通古人之遺意也。仿紀傳正史之體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體而作掌故，仿《文選》、《文苑》之體而作文徵。三書相輔而行，闕一不可。」（《方志立三書議》）地方志的編纂必須包括人物傳記、典章制度和文學記載，「三家之學」就是章學誠所說的「史法」。在這些問題上，章學誠和戴震、洪亮吉等同時著名學者之間是有爭論的。戴震認爲地方志應重視地理沿革，不必「侈言文獻。」

（《記與戴東原論修志》）章學誠則堅持地方志不僅包括地理沿革，更應「表章文獻」。《常德府志序》十分明顯，這也是與他的史學所以經世的主張是一致的。章學誠認爲「如云但重沿革，而文獻非其所急，則但作沿革考一篇足矣。」他的立論根據是「古今沿革，非我臆測所能爲也。考沿革者，取資載籍。載籍俱在，人人得而考之。雖我今日有失，後人猶得而更正也。若夫一方文獻，及時不與搜羅，編次不得其法，去取或失其宜，則他日將有放失難稽，湮沒無聞者矣。……考古固宜詳慎，不得已而勢不兩全，無寧重文獻而輕沿革耳。」（《記與戴東原論修志》）章學誠認爲要編纂一部好的地方志，編纂者必須弄清楚「全史之通裁」，《大名縣志序》而「全史之通裁」的最主要之點，在於能够嚴格區分地方志和地理書的不同；必須瞭解地方志「爲天下之史所取裁」，人物傳記和文學書目應當詳細記載，其編纂體裁應當嚴守「史法」。

章學誠對舊志老一套的八股腔和輾轉因襲的文風，也很爲不滿。他批評舊志的人物傳記，往往「其文非敘非論，似散似駢。尺牘寒溫之辭，簿書結勘之語，濫收猥入，無所剪裁。」「至於品皆曾史，治盡龔黃，學必漢儒，貞皆姜女。面目如一，情性難求。」雖然也有文字較好的，「又簡略其辭，謬託高古，或仿竹書記注，或摩石刻題名，雖無庸惡膚言，實昧通裁達識。所謂似表非表，似注非注，其爲痼疾久矣。」（《亳州志人物表例議下》）爲了改革這一「痼疾」。他曾親自進行實地考查，廣訪博搜，徵集史料。他所編撰的方志，在這方面也有不少改進。

清代十分重視編纂地方志，康熙以來，多次下詔修志。章學誠根據他自己長期從事編纂地方志的切身體會，

提出全國各州縣應相應設立「志科」，作為編纂地方志的專門機構。他在《州縣請立志科議》中建議：「天下政事，始於州縣，而達乎朝廷。……而州縣記載，並無專人典守。……間有好事者流，修纂志乘，率憑一時採訪，人多庸猥，例罕完善，甚至挾私誣罔，賄賂行文。」正因為州縣是國家政權的基層組織，地位十分重要，但像編纂地方志這樣的大事，却没有專人管理，「率憑一時採訪」，草率從事，以至弊端叢生。因此他又提出：「州縣立志，不可取辦於一時」，要求「特立志科，僉典史之稍明於文法者以充其選。而且立為成法，……」。章學誠建議州縣設立「志科」，使全國從中央到地方有一套完整的修志制度和機構，積累原始資料，為以後修志打下堅實的基礎，避免「取辦於一時」所產生的種種弊端。綜上所述，章學誠為了建立新的方志學，是竭盡了畢生精力的。

章學誠一生著述甚為豐富。代表作有《文史通義》和《校讎通義》。在畢沅主持編纂《續資治通鑑》時，亦曾襄助其事。他自己編纂的地方志，據記載有《和州志》、《永清縣志》、《亳州志》、《常德府志》、《荊州府志》和《湖北通志》等。自稱《亳州志》體例始稱完備，至《湖北通志》，更為精審。但他一生坎坷，學術主張多不投時好，以至他的著述多遭散失。所修《和州志》、《亳州志》均係未經最後完成之作。《湖北通志》雖已完成，但原稿被人刪改，只殘存五卷。章學誠生前刊布的《文史通義》，僅是一小部份，也不見流傳。直到他去世後三十一年之久，在道光十二年（公元一八三三年），其次子章華紱幾經周折，才在河南開封刊刻《文史通義》八卷和《校讎通義》三卷，得以公諸於世。《校讎通義》最早原稿也被「盜竊」，不知去向，第四卷因而亡佚。他念念不忘的《史藉考》，似也沒有最後完成。因此，在章學誠生前，有機會讀到他的著作的人很少。他在《與族孫汝楠論學書》中說：「所撰著，歸正朱先生（筠）外，朋輩徵逐，不特無甘苦可告語，且未有不視為怪物，詫為異類者。」在這寥寥數語中，我們可以想見章學誠一生的不幸遭遇。章學誠晚年目盲，生計困窘，仍著作不輟，常口授由他人記錄。章學誠這種「不羨輕雋之浮名，不揣世俗之毀譽」的精神，是值得稱道的。

章學誠是封建時代的學者，他經世致用的學術主張和「六經皆史」的學說，豐富了我國史學史和思想史的理論遺產。當然在他的許多見解中，必然帶着時代和階級的局限，也是我們研究中需要注意的。

章學誠臨終前曾以編輯遺稿之事托付蕭山王宗炎。王宗炎編次三十卷，未及定稿而病故。稿本後歸沈曾植。吳興嘉業堂主人劉承幹據沈氏藏本重加修補，增入《和州志》三卷，《永清縣志》十卷，《乙卯劄記》、《丙辰劄記》、《知非劄記》、《閱書隨劄》和《信摭》各一卷，別爲外編十八卷。又加補遺、附錄各一卷和目錄一卷凡五十卷。另續增《歷代紀年經緯考》一卷、《歷代紀年韻覽》一卷，定名《章氏遺書》，於一九二〇年刊刻行世。此外，尚有會稽徐氏抄本和山陰何氏抄本傳世，亦稱完善。前者由浙江圖書館排印出版，後者有馬夷初先生轉抄本，曾由杭州日報、中國學報傳印出版。劉刻在後，徐、何諸本勝處，劉刻都已經注意吸收。但章學誠著作生前頗多散失，劉刻本行世後，仍陸續有所發現。如前燕京大學舊藏武昌柯氏抄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章華紱抄本、北京圖書館藏翁同龢舊藏朱氏椒花吟舫抄本等，頗有劉刻所未收錄者。

本書據吳興嘉業堂劉承幹刻本斷句影印，並附王秉恩所著《校記》一卷，書名改爲《章學誠遺書》。爲便於讀者研究參考，從北京大學圖書館藏章華紱抄本選錄《與孫淵如觀察論學十規》等十四篇，和北京圖書館藏翁同龢舊藏朱氏椒花吟舫抄本選錄《書左墨溪事》等四篇，約五萬餘言，分別作爲「佚篇」，標點排印在全書之後。在工作中得到李學勤、樓宇烈和祁龍威等同志的熱情贊助和支持，並承許覺民同志在百忙中爲本書題簽，謹致深切謝意。由於我們水平有限，錯誤和不當之處在所難免，敬希讀者不吝指正。

壬戌閏夏

章氏遺書

朱孝臧

嘉	吳
業	興
堂	劉
棨	氏

翰怡京卿刻章氏遺書成，以余佐編校之役，謂余曰：實齊先生之學，君嗜之特深，其無一言以讀述之乎？余不敢辭，爰爲之序。曰：先生之學，精深博大，其傑然成一家言哉！先生湛於史，年少時，取左國諸書，分爲紀表志傳，作東周書，幾及百卷，其書雖不傳，知先生之於史學，殆天性然也。又嘗爲春秋凡例，書撰史籍考，世亦未見傳本，觀其目錄，自制書以下，凡爲類者十二，至其條例，如所謂古逸宜存，家法宜辨者，析之爲十有四，大體一準經義考。此書存，讀史者所獲裨益，必匪淺鮮。惜乎其有酒誥俄空之歎也。從來論史家得失者，莫詳於唐劉知幾六家二體，爲後世修史者作之則，其大要則歸之才識學，蓋謂具此三長，乃可與語乎史也。先生推崇史德，以爲著書者之心術，不可不慎，如此則褒貶予奪，悉秉至公，而人禍天刑，可無顧慮，豈非較子元之說，進而益上，尤得春秋微婉之義哉！當先生時，學者溺於聲音文字，相習成風，別樹漢幟，其極也。文雖破碎，先生則一言蔽之曰：六經皆史，窺先生之意，六經爲先王政典，孔子所以刪述之者，實萬世治術之所從出。漢儒以禹貢行水，以公羊決獄，皆原本經義，潤飾吏治，斯可見先聖經教，無不可措之行事者也。後之儒者，高言性道，既失之玄虛，斤斤於名物訓詁，亦不免爲苟取譁眾，博而寡要矣。今夫簿錄之學，史官之所以辨章道術者也，自班固作漢書，首纂藝文志，後史因之，究其學之所本，則託始於劉子政氏，每一書竟，條其篇目，撮其旨意，固不僅文辭異同，詳加証正而已，必通乎古今派別，識作者立言之指，而辨析其是非，故孟堅但知備篇籍，將其輯略一類，揭羣書之綱要者，毅然刪去之，此則大可憾也。先生熟精流略，所著校讎通義，考鏡源流，捫捫利病，孟子知言之學，庶幾得之。近世顧千里輩，是猶不賢識小，彼鄭樵焦竑，亦豈能如先生之窺乎其大，然則上接中壘之傳者，徵先生其誰與歸？願先生遺時不偶，身未列乎國史之職，鬱鬱無所試，其所表見者，惟此方州志乘耳。然

湖北通志，則爲人所改竄，和州一志，散失之後，寫定二十篇，非復全帙，祇承清縣志，尙稱爲完本。而天門則非其主名，亳州又世所罕觀，吾於此不能無文獻不足之感也。雖然，得其敘說讀之，正列女之目，次前志之傳，掌故文徵，各自爲篇，創通義例，折衷經史，其論皆日月不刊，真可懸之國門，而莫能增損者也。或問曰：先生爲史才，文則非其所長與？曰：是不然。先生之文，蓋取達意而止，夫文以理爲主，先生本其中之所得，著之於書，惟求乎理明而辭達，昔樂廣善於清言，而不長於手筆，請潘岳爲議表，潘曰：要得君意，樂爲標位二百許語，潘直取錯綜，便成名筆，是古人有意所欲言，筆不足以達之者，先生之於學，類能自闢新意，而筆則無不達之患，則先生之長於文也可知已。且先生特工論文，集中文德文集諸篇，或顧心氣之檢攝，而持之以敬，或慨著作之衰微，而返之於古，誠謙家可之所云，道人之所不道，到人之所不到者，宋劉摯之訓子孫也。曰：一號爲文人，無足觀矣。先生其文人乎哉？抑先生不徒非文人已也，其器識宏通，議論奇肆，原道言公之作，一則探政教之源，一則駁名實之辨，至於婦學詩話，所以爲世道人心憂，有子與氏息邪距諛之志，顧亭林嘗謂文須有益於天下，此二篇者，有益風化，關係天下爲至巨，此蓋洞明乎治亂興亡之故，亦由其得力於史者深也。嗚呼！周秦而後，諸子專家之術，寂滅而無聞，士之能文者，往往自義不純，偶然無所歸宿，欲如昌黎之爲儒，柳州之爲名，荆公之爲法，眉山之爲從橫，不數數遇，先生則意無旁軋，反復推詳，一抒以獨得之見，萬變而不離其宗，戰國時道墨諸家，各崇所長，以明其指，正如是也。龍門史記自序，稱爲成一家之言，非先生之謂哉？余往在弱年，始致力於考據之學，久之而病其繁瑣，不足爲傳世之業，而子勝斐然之志，則未或有聞也。及得先生書，讀而善之，將有所造述，又不勝劉彥和就有深解，未足立家，搦管而墨，乃始論文之慮，於是攻習百家，遺其章句，神思冥廬，輒有那獲，雖先生治史，余則治子，趨向自異，要其屬類

引伸，則一本乎先生爲學之方。吾師乎？吾師乎？未敢昧所自也。先生之謨，刊本行世者，僅文史通義一二種，今幸而獲觀其全。京卿之功，余爲之釐篇第，糾謬誤，亦與有力也。世之願學先生者，眾矣，倘守其成說，而不加推闡，資其雄辨，而但務新奇，未爲知先生者，竊不自揆，舉其學術要略，著之此篇，庶承學之士，得以覽觀焉。壬戌八月，元和孫德謙。

序

實齋先生著述宏富，易寶時以全稿屬蕭山王穀騰編定，今所行世文史通義，校讎通義，蓋不及全稿三分之一。且多其子姓丐人竄改，識者病之。吳興劉翰怡京卿得嘉興沈寐叟丈所藏先生原稿，則數勝所編次皆在焉，又益以未刻諸書，鳩緝最錄，合若干種，若干卷，於是先生之學，賅備殺青，可繕寫以序命余。余曰：此夙昔之志也。書既成，序之以宙合之學之華也。因夫恆幹皆有所藉，瞿曇氏觀十二因緣而悟道海，彼之學純猶物質，邦學而無藉也。如其有，則非史不足當之。人之一生，曰始，曰壯，曰究，人類之一期亦然，彼其古今成敗禍福存亡之迹，與夫蕃變之所由然，苟無史焉，雖聖者無所麗其思，而一切道術，且將不立，史也者，彰往而察來者也。老之術，葆之於始，孩孔之術，瞻之於既壯，而皆所以坊其究，究則聖者不忍言矣。故六藝大原厥維史，諸子立言，雖其精粗本末不同，而皆籍於史。自劉向氏後，經籍道熄，綴學清猗，以自爲方，六朝汨於玄，宋明以來，茹於理，乾嘉間，休寧高郵諸儒起，始稍稍有窺於遺經，然而一出焉，一入焉，恆幹之亡，已伏於茲，儒者智不足以知聖，其於六籍之原，匪特不敢言，抑且不能言，則相與正訓詁，明音韻，考名物，數度數，曰：吾且爲之郵焉，及其蔽也，棄本逐末，至視前經往誌，與商之龜甲文，周之毛公鼎，散盤，秦漢之瓦當，曾無以異，酸醜相循，迄今若絕而未遽絕者，特好古之一念，僅以維繫於人心也。一旦好古之念去，而人之禍亟矣。先生當舉世溺於訓詁音韻

名物度數之時。已慮恆幹之將亡。獨昌言六藝皆史之誼。又推其說施之於一切立言之書。而條其義例比於子政。辯章舊聞。一人而已。然而世之宗休寧高郵者。其議先生也且百端。吾則以為先生之召世疾也。蓋有五焉。何則。為休寧高郵之學者。憑據佐驗。得一孤證。即可間執承學之口。而不必問其全書宗旨之如何。不通。則引申假借以說之。又不通。則錯簡衍文以遷就之。為先生之學。則每立一例。必穿穴羣籍。總百氏之所擇。而我乃從而管之。故為先生之學也。拙。而為休寧高郵之學也。巧。人情意巧而惡拙。一也。為休寧高郵之學者。勞於日治。逸於心獲。但使有古類書字學書數十種。左右鈎稽。一日可以得三四條。為先生之學。則其立義也。探賸甄微。徬徨四顧。有參考數年而始得者。亦有參考數十年而始得者。及其得也。適如人所欲言。則人之視之也。亦與常等矣。故為先生之學也。難。而為休寧高郵之學也。易。人情趨易而避難。二也。為休寧高郵之學者。嚴絕勦說。故必引據成文。往見時賢解經之書。王伯申說。段茂堂說。開卷爛然。非是則人以為陋。為先生之學。則不然。有鑒括成文者焉。亦有不必要鑒括成文者焉。同不是異不非。惟義之與比。放諸四海而準。公諸四達之衡。而人不能竊。故為先生之學也。約。而為休寧高郵之學也。博。人情尚博而鄙約。三也。為休寧高郵之學者。意主疏通以求是。解一名。詳一訓。雖繁殺殊科。而其義也。皆有所底。為先生之學。則規矩誠設。其用無乎不在。有略引其端。以俟好學深思之自反者。有泛稱廣譬。駭之造述。而後確者。雖復節目有疏落。援攷有外繆。而正無害其大體。故為先生之學也。虛。而為休寧高郵之學也。實。人情畏虛而夸實。四也。抑又有其可異者。為休寧高郵之學者。以墨守為宗。再傳而後。疲精計鄭。至甘以大義微言。拱而讓之宋儒。侯程朱者。意其不我抵牾也。則往往援之以自重。為先生之學。則務矯世趨。羣言穀列。必尋其原而遂之於大道。雖以舉世所鄙棄之鄭漁仲舉世所皆毀之象山陽明。先生揚推所及。亦且時時稱道焉。

先生以不黨救黨。而守門戶者以為黨。先生以不哀治衰。而昧別識者以為衰。故為先生之學也。逆風會。而為休寧高郵之學也。順風會。逆則不樂從。而順則人人皆驚之。五也。五者浸以成俗。則先生之書之不大顯於時也。固其宜矣。雖然。學之為術。有統有宗。必倫必義。或治其分。或攬其總。雖相迥而實相濟。譬則振裘然。先生絮其領。而休寧高郵諸儒則理其髣。為先生之學。而不以休寧高郵精密微實之術佐之。憑臆膚受。其病且與便詞巧說者。相去不能以寸。為休寧高郵之學者。苟無先生。則經藝大原。學之恆難。必至盡亡。始也以古為舊。奮者。繼且微之。而薦芻狗。以芻狗為學。則我宗邦之學。乃真可以拉雜而燒之矣。今者聖伏神徂。一二孺子守見聞。槁項指舌。方日乞殘鉛蠶。槩以自活。向之訓詁音韻。名物度數之學。舉不足以墮斷流之禍。而先生之書。乃稍稍有好之者。出焉。意者古哲人憂患。前民之一經。其將自先生而復歟。抑惟異欲聞。或借先生之說。推陷舊藩。以為泰火之導歟。宣尼悲麟。出非時。反袂沾袍。而傷道窮。吾今幸見先生之書之傳。雖意也。而又不不能無懼焉。已。喪亂餘生。精神遐漂。不復欲以語言文字禍古人。感京卿繼絕之雅。心所蘊轡。聊復一書。辛酉孟夏。錢塘張爾田識。

序

我朝學派。開自亭林。其後發源有江慎修。休寧有戴東原。歙有程易疇。由聲韻訓詁名物度數。以返求之於諸經。一洗前代儒者膚受之陋。其所變易。灼然如晦之見明。其所彌縫。奄然如合符復瓿。三吳間。則惠定宇治易。莊方耕治春秋。西京堅緒。亦稍稍萌芽。東原之學。傳於南有段若鹿。傳於北有孔異軒郝蘭皋。其在江淮者。汪容甫劉端臨之倫。翁聲而桴應之。而高郵父子。則以朴才精識。誕正晚周先秦書。哀然為乾嘉大師。說者謂古學復興。遠邁唐宋。而吳皖淮魯諸儒。實啟其先。可謂盛已。然此皆浙西產也。當時浙東與亭林並世。則黃梨洲氏獨行戴山之傳。下開二萬兄弟。再傳而得全謝山。三傳而得邵二雲。而實齋先生實集其成焉。先生之學。其與密繁博。或不逮吳皖淮魯諸儒遠甚。即其文事僅藹。亦不如容甫輩之淵雅。然識足以甄疑似。明正變。提要挈綱。卓然有以見夫經史百家之支與流裔。而得大原。則有非諸儒所能諦言者。蓋吳皖淮魯諸儒之學。精於經。而先生之學。則密於綜。吳皖淮魯諸儒所用以為學之術徑。惟先生能會其通。亦惟先生能正其謬。以唐宋以下言之。吳皖淮魯諸儒實為古學之功臣。而以國朝一代言之。則先生又為吳皖淮魯諸儒之誼友。二者如兩曜之麗乎天。非是則不能以代明。又如車之雙轂。非是則不能以致遠。吳皖淮魯諸儒之學。既世學者承習。寢成風會。破壞形體。支離大道。而治西京言者。則又敢為非常異義。可怪之論。其所治也。益精。其為效也。益小。而見之於世也。益荒。蓋自道光中葉。以迄於今。八九十年間。學統凌夷。由盛而衰。駸駸絕矣。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然則居今日。欲挽末流回亢之失。而納諸正軌者。舍先生將何從哉。世衰道微。邪說誣民。又作至有奉吳皖淮魯諸儒為正宗。謂曲符乎科學方法者。夫彼以其異域謫觚之譚。文之以荷鉤鉅析亂之術。而強附於吳皖淮魯諸儒。使吳皖淮魯諸儒有知。其許之乎。其必黜夫外襲者。而引先生為知己。可斷言也。先生書曾一刻於大梁。再刻於浙江貴州。乃其子姓改竄者。鈔本流傳。歧異錯出。前歲始得見王穀陸原編於沈子培。尚書託爰錄而覆刊之。又益以已刊未刊諸書。都為一集。以備先生一家之言。世有精研浙東之學者。得先生說。因其已知而益窮之。以蘄與吳皖淮魯諸儒之學。溝遂相通。斯固先生未竟之緒。抑亦余小子區區纂書之意也。夫辛酉重陽節。吳興劉承幹書於西湖留餘草堂。

章氏遺書例言

一賈齋先生遺書世所通行者爲文史通義校讐通義而已其他文集及湖北志稿間有單印本彙成一書者則未之聞今假白沈乙齋尙書所藏鈔本兩通義外又有方志略例諸種復從尙書處借得和州與永清縣二志余又獲購庚辛之問亡友傅益以風雨樓印行信撫一卷雖天門縣志非出先生手纂而毫州志史籍考諸書未見傳本先生平生著述猶不足窺其全貌今爲舊萃付刊成一家言亦庶幾告備矣

一先生遺書鈔本原有戊午鈔存庚辛間草諸目蓋當時稿本必分年錄次各自爲篇今目錄係蕭山王穀應先生所編凡三十卷其和州志永清縣志則僅以篇計不分卷數今析和志爲卷三永清志爲卷十合之信撫五種定爲外編十八卷加以目錄一卷及補遺附錄都爲五十卷云

一王氏原編目錄於校讐通義外篇內有和州志藝文書例議方志略例二中有和州志皇言紀序并湖北通志人物表敘例諸篇今和志刻入外編而湖北通志檢存稿則載錄於後故刪除其目以免重複

一今方志略例二中所有答甄秀才論修志數書與修志十議以及天門縣志諸序爲王氏原目所無今從刻本文史通義載人其卷二十九外集中自與史梧園書以下詩文則鈔本所有而王目亦不登今悉取以備列於後此等皆不錄補遺而概附內篇者以補遺乃采自他書見之刻本鈔本者不得目爲佚文也故內篇編次雖大體一本原目不無增損於其間

一其文爲鈔本所載王目未編入者如卷八朱先生墓誌書後下今有說文字原課本書後一篇卷二十八記館穀二事下今有上朱中堂世叔諸文非敢亂其次序以王目一采庚戌鈔存雜文一采傳

記小篇其原第如此也

一排比文字古人皆以詩賦各爲一類原目卷六文史通義內篇六載有感賦一篇卷二十八外集一載有丁巳歲暮書懷投贈賓谷轉運因以誌別詩一首似非分別部居不相雜廁之義考孫卿子賦篇與成相饒均入全書之內則古書自有其例今故以詠史諸詩即次卷二十九中題隨園詩話亦附之卷五詩話後

一古書有文字闕佚而仍列其目者此固春秋夏五郭公之例蓋存其舊目不爲刪削者所以備後人之搜訪也今如與孫淵如觀察論學十規諸篇凡爲王目所有而鈔本未見其文者故於目錄之下皆注原缺二字

一書坊刻詩話後王目本與詩話篇並列今按宋陸篇書後例改附詩話之下其卷十四湖北通志檢存稿續續略一篇原目亦與政略敘例相列今以續續乃政略中子目故亦移其目於敘例下

一湖北通志未成稿此一卷中未經編訂漫無條理今約略以類相從俾眉目清析不致如原本之殺亂較之王潛剛印本以大京官等爲本地人士政績誤次職官表中全無倫類者似尙率然有當其時代先後不能厥協整齊者王氏以未成稿稱之殆亦識其理董之不易故今於五世同堂諸目一仍舊貫不爲芟削所以存其真先生長於校勘之學體例最精今瑣碎若此知此稿必非定本也名宦列女兩目王目皆無今鈔本中有名宦張炳魁條故即用以標題其大京官小京官諸條遂亦歸入其中凡志家於鄉邦耆舊有政聲者往往別名宦職此最近於類書當爲先生所不取故易以名宦之稱至列女一門應以列女爲總目原目以節婦冠首烈女各目則附於其下似亦失之今據先生原定目改焉

一王目編訂其文字皆取先生原書如禮教本之戊申錄稿經解三篇本之庚戌鈔存通義是也今外編知非日札中所載周官媒氏柏舟之詩六條王氏定爲述學駁文已入之文史通義外篇內各文既相同無用複出爲刪去之此外凡已見內編者同

一永清縣志先生本爲知縣周震榮作此志原刊本遂有臣震榮云云名從主人理所當然但文史通義諸刻本則無此等字樣蓋既入先生遺書不可猶沿襲舊文也今從其例凡震榮姓名故亦一概削去云

一補遺皆取鈔本外見之他書者其墨蹟亦得自己愈尙書所藏惟原本並無題目今細按文義知與朱竹君父子兄弟往還信札故爲分別標題

一王目如古文公式省去古文二字諸如此類不免過從簡略今悉用通義諸刻本至於文字之間鈔本勝刻本者甚多則擇善而從折衷去取如引用書籍或辭句中出傳寫之誤確然可知者則爲之略加改正若各本皆同而其語意未甚愜當者又無別本可校則一守闕疑之義不敢專輒蹈輕改古書之失

一凡書內前後文辭重複理宜刪存其一然中墨校錄之例則不然晏子春秋書錄云又有復重文辭頗異不敢遺失復列以爲一篇而卷七中並標明之云此章與景公酒酣願爲無禮晏子諫大旨同但辭有詳略爾故著於此篇此章與景公登牛山而悲登公阜瞻懸星而感旨同而辭少異爾故著於此篇姑舉此二條足知辭句有詳略異同者當並著之今卷二十三祭漢太尉楊伯起先生文與卷二十九附八弔楊太尉墓題既不同而祭文首有年月致祭篇末有尙贊等字弔則無之幾成四言詩體又湖北通志未成稿節婦李氏張廷儒妾傳與檢存稿中附葉張汪四節婦傳文同而字句則少異今即用其例因兩存之不復刪云

1